



# 乡村叙事与田野工作的滋味

孙庆忠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70623.013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的东北部,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古村落——泥河沟。2014年4月,这里因36亩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同年11月,这个偏僻的山村又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些接踵而至的名号,令曾经无闻的村落名声鹊起,也使村民燃起了重拾旧事的热情与渴望。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在通过多方参与机制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项国际计划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我们又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基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我带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先后驻扎在村里56天,以采录口述的方式,与村民共同完成了3卷本丛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掠影》、《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的编撰工作。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我们把村庄的历史与当下链接在了一起,使村民由遗产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自身文化的讲述者。这种“社区感”的回归,也在客观上提升了村民改变处境、创造生活的能力。

## 一、你来采访时他已赶赴黄泉

2014年6月,因为千年枣树的吸引以及对枣园近旁村落的想象,我来到泥河沟村。在这个古朴宁静的村落,窑洞与枝繁叶茂的枣树相映成趣,川道与纵横的沟壑相得益彰。我在惊叹自然景观的同时,深感遗憾的是,传承久远的村落没有文字的记载,盘根错节、枝杈旁飞的枣树也无神奇的传说。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村庄

没有历史,只是乡村的往事没有写在纸上、印在书里,农民对家庭的情感、对村庄重大事件的记忆,都展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深藏在泥土里。因此,挖掘村庄历史文化,口述采访成为唯一的途径。入村之后,我曾寻找熟知村庄掌故的长者。但令我感伤的是,我到泥河沟那天,正是村里武国雄老人的周年祭日。无缘与这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队书记、小学校长谋面,使我愈发理解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位老人等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这件事情催促着我加快工作进程,通过唤醒村民记忆的方式,为泥河沟留下一部可以定格历史并呈现当下村落形态的文化志。庆幸的是,在此后搜集口述资料的过程中,村民的讲述以及浸透其中的丰沛情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泥河沟采录一部口述历史的愿望也便由此萌生。

为什么要抢救农民记忆中的历史?因为乡村在逐渐落寞,因为乡土渐行渐远。在传统社会,老年人讲故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传递功能。但随着录音机、录像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对口承知识的依赖越来越小,老年人在乡村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然而,就泥河沟而言,如果缺失了老年人的生活记忆和生命体验,村落的历史将是苍白的。也许有人会问,存留农民的生活琐事有那么重要吗?我们试想,一个人如果突然失去记忆,对曾经的生活全然忘却,该如何面对明天?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记忆,情感又如何维系?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过往的历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国家就会无法发展,民族也会失去生存的根基。我们极力倡导抢救民间记忆,把它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因为那些足以留住根脉、凝聚人心的记忆,可能会在转身之间消失,与世代累积的乡村生活永久地告别。

2017年1月13日,当我们再次赶赴泥河

沟时,老妇女主任郭宁过(1936年生)驾鹤西去。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她曾幽默风趣地对我们说“当年来的时候,没有聘礼,也没有嫁妆,做了一套新衣新裤,骑着毛驴就糊里糊涂地嫁了过来。”更令我难忘的是,老人家带领铁姑娘队、红色娘子军队,为保护枣园修建堤坝,用肩挑、用背扛、用拉拉车从山上运石头到黄河边的往事。我很幸运,能够亲耳听到她的诉说,与她一起重温过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她的名字难以写进大历史,却应该与泥河沟同在!

## 二、生活碎片拼接的村落历史

我们搜集的老照片、老物件、老文书,承载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和村庄故事;我们抢救的口述资料,呈现的是个人的生命史与村民的集体记忆。我们采访了长期居住在村中的老人、不同时期流动出村的年轻人,以及为村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干部。他们看似平淡的讲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冲击。无论是武爱雄(1925年生)“为枣卷卷顶神”的顽童故事,还是“后村孩子王”武国柱(1933年生)的娃娃琐忆;无论是“借个毛驴儿娶媳妇”的武子周(1947年生),还是讲“红枣就是我命根子”的武买保(1955年生),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记忆,不仅展现了陕北的地域风情,也张扬了叶与根的情义。

泥河沟村地处黄河中段晋陕峡谷西岸,属于沿黄土石山区,生态脆弱,旱涝灾害频繁。因此,在村民零散的生活片段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灾害的记忆是最为核心的主题。一辈又一辈人拦河筑坝,一代又一代人守护滩地枣林。在这些应对灾害的生存智慧里,是与枣树同步成长的青葱岁月,是被黄河推走的青春时光。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那些村民不堪回首的往事总会不召自来,走40里山路去通镇背粮的艰辛历历在目,移民山西、内蒙古的窘迫犹在心头。1976年发生黄河船难,21条生命的离去更是村民最痛楚的记忆。当然,恩威并济的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也有言说不尽的欢乐与幸福。诸多能工巧匠的文化创造,使窑洞、河坝、漫水桥等

工程成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使湾、塌、坡、茆、梁成为可以驻足欣赏的人文景观。在这些村庄事件的叙述中,石匠武子勤(1933年生)、艄公武占都(1940年生)、铁匠武耀增(1953年生)、主持修缮村庙的武岳林(1944年生)、两度当选村书记的武世峰(1946年生),他们的人生起伏是不同时代村落生活的投射。在这组老人群像中,王春英(1943年生)是唯一的女性。她18岁嫁到泥河沟,像养孩子一样栽种、呵护着枣树。这份特殊的情感使她与这块土地、与黄河、与拦河堤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从母亲的视角讲述了集体化时期白天出工修田背石、晚上回家织布缝衣的生活状态,贯穿其中的是人与枣树、人与土地、人与大河的复杂情感。

除了这些生活在村里的老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读书、招工、当兵而走出村庄的人离乡虽久,却思乡心切。改革开放后,游走于城乡之间的“60后”、“70后”和“80后”,有读大学出村的,有在外打拼的,也有回村创业的。他们的人生际遇代表了一代乡村青年对生活的梦想。他们的讲述里有孩童时期在村中玩耍的真情,有生活困难时期的苦中作乐。追忆时,这些都已转换成他们对村庄的拳拳深情。这些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论路途有多远,不论时间有多久,他们的生命都与家乡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项采录口述资料的工作,让我们获得了昔日重来的惊喜。在村内老人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曾饱受黄河之苦,也曾享用水运之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公已走下船头,但与大河相关的苦乐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与汗水和泪水共同刻录在乡村记忆中。正是通过这样的采访,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而对那些漂泊在外却心系家乡之年轻人的访谈,则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跃出农门”的强烈愿望和栖居城市的生存困境。他们创业打工的经历,是30多年来农民

群像的缩影。因此,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命历程。翻阅这些口述记录,小规模社群生活、重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会鲜活再现。当然,口述史的价值远非如此。在一段段独白中,他们看到了自己和家庭、村落之间的联系,在村老人理解了年轻人走出村落的艰辛,打工在外的年轻人理解了河滩上每一棵枣树、堤坝上每一块石头对于父母的意义。正是这种倾情的讲述,让年轻人思乡心切,让老年人想儿盼归。

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我们可以与千年枣树朝夕相伴,却难以揣度它们所经历的世事沧桑。而今,在它们悄无声息的凝注下,我们问询泥河沟的历史,记录村落的当下形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不让我们的子孙丧失与祖先对话的能力。尽管社会变化太快,好像只能徒留“转身的忧叹”,但是透过村民的生活叙事,我们可以直接触摸陕北的村落民俗文化。在多人讲述的村史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黄河、与黄土地联系在一起。从拜师学艺当石匠到拉船运输做艄公,从修筑筑坝到“奶菜”“浮河”,从龙王庙、河神庙的重修到枣神菩萨的供奉,都展现了沿黄民众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尤其是正月初三至初五的打醮仪式、三月十二的佛堂寺庙会,这些传统仪式每年的如期“复活”,创造了历史与现实、心灵与身体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这种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村民在回忆过往生活,但其实质是村民以文化记忆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打醮转九曲、唱戏敬神等传统仪式的复归,不是让我们重返过去,也不是让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而是通过重塑村庄的集体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碰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这也是乡村文化传承不息的内在动力。

在这个村庄凋敝、生活记忆不断被删除的时代,老年人无力言及农耕经验,尽管其中蕴含着当地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环境意识,年轻人迫于生计无暇顾及乡村,甚至为了生存而有些失魂落魄。那么,如何促发乡村的改变?如何让农民重新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归属与认同?最为根本的前提就是乡村文

化的复育。我们以民众参与的方式,与村民共同找寻历史,让没有自信的老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有了守望的热情。与此同时,我们这份力量的注入,也让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年轻人有了回望的心念。无论是老人的守望,还是年轻人的回望,正是这份怀旧和乡愁,不断地唤醒他们热爱故乡的情愫,支撑着他们营造一个诗意栖居的精神故乡。就此而言,碎片化却熔铸了生命体验的村落历史,不仅承载了柴米油盐中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也让我们看到古老村落里潜存的生机,看到了乡土社会的希望。

### 三、田野思绪里的无奈与忧伤

口述史是朴素的乡村叙事,也是我们与村民共同完成的作品。一次次对坐长谈、一次次沟壑踏访,使单纯的生活旧事变得鲜活灵动。信任是讲述的基础,真情是倾听的前提。正是因为彼此的接纳,那些平淡却藏着希望的日子,才总能让讲者黯然神伤,让听者泪满双颊。就此而言,口述史虽是村民个人的生活史,但字里行间也同样流动着采录者的情感——一份因专业所学而生的社会责任,一份重新理解乡土中国的能力与信心。

回望所来之处,从第一次到泥河沟,我的心就放不下了,不仅因为千年枣树和古枣园近旁宁静的村庄,还有淳朴的村民以及他们与贫困抗争的生活!这里隶属于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吕梁特困片区。除了五保户、病灾户和残疾户之外,全村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状态相差无几,小康的生活目标依旧高悬。三年来,每当听到泥河沟春旱无雨,枣花无法坐果时,每当听到打枣前雨水连绵,果实又烂成一地的时候,隐隐的痛就会在我的心里自然萌生。我曾反复地追问,这里毗邻黄河,历经无数次的灾难,枣树何以持续千年?生活困顿的村民,为何还要祖祖辈辈守望这贫瘠的土地?在与陕北地域文化亲密接触的日子里,我对枣树的生长特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村民坚忍而内敛的个性品质、勤劳而简朴的生活习性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却从不言放弃,

始终对明天的生活报以积极的想象。

2015年7月13日是入伏的第一天。按照当地的习俗,村民要去“浮河”,他们相信黄河水可以把自己身上的病痛和晦气统统洗掉。我走进大河并在临近岸边的石头旁坐下,任凭河水从我的肩头流过,与乡亲们共享这炎热夏日里的清凉。当我看到高曹平翻滚几下就到了黄河中间的滩地,而后起身在滩上奔跑时,我被那一幕深深感动了。在午后的阳光中,陕北汉子的健壮与黝黑的肤色显得格外醒目。当他从远处跑到我的近旁,当我看到他脸上划过的憨憨而畅快的微笑时,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默无声息。那一刻间我在想,在这个贫困的村落,红枣几近连年绝收,也许在他的生命里,唯有在黄河滩上赤身奔跑的这个瞬间,如孩童般自由,忘却了去年的收成,忘却了生活的烦恼。也是在那一刻,人和自然是和谐的,人的自由生命和这个世界是一体的。看他奔跑的那一瞬,和他对视的那刻间,我多么希望那黄河的水再柔一些,再慢一些,能够让我们的村民感受到轻松畅快的时间再长一些。

2016年1月13日是我们团队冬季调研离村的日子。当送我们的车驶过观音庙时,武小斌播放了一曲陕北人耳熟能详的《闹秧歌》。不知为何,多日里积压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流泪的冲动演变成了眼前景致的模糊。我想到了去往朱家瓜时路边的风景,想到了静寂夜晚泥河沟窑洞里温暖的灯光。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大地,虽苍茫壮美,却总是让悲凉的情绪不召自来;散布在石圪圪台上的窑洞,虽错落有致,却总是与艰难的感受齐聚心头。于我而言,这一年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不仅因为气温的骤降,而是因为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天灾的降临,人祸的接踵而至,我听到了“生灵的叹息”,感同身受了他们生活的无奈。然而,家庭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无论是年迈的父母,还是承受生活重压的儿女,并不依靠救济度日,他们相信自己的双手,相信看似无望的生活一定会有转机。我为他们的生计状况忧伤,更为他们胸襟的豁达惊讶,这就是平凡世界

里的悲喜人生吧!

在村里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在窑洞外独坐,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当我看那漫天星斗的时候就会想到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路遥去世15周年的时候有一本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作家王安忆在《黄土的儿子》一文中讲到路遥的一段往事。当冬天过后,走在满目黄土的山里,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的桃花,此时本该满心欢喜为着春天的到来,但是路遥却眼里浸满泪水。当我背靠着窑洞仰望星空的时候,我理解了路遥。在那孤寂的日子里,面对满目萧索的环境,心底里还藏着一个很遥远但却依稀可见的希望。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火辣辣的希望,所以才让这方水土养育的村民在灾害频发的岁月,在孤助无援的时候,仍然坚定活下去的勇气!

在泥河沟空寂的山野里,漫天的星斗总会带给我独特的心灵体验。在那里有人和自然的亲密交流,传递的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我们却不能停止脚步。我们不只在记录乡村的当下,更是在挽救我们自己的未来。2013年12月7日钱理群先生在农大演讲时,结尾的一段话让我始终难以忘怀。他说“作为一个践行者也许我们是孤独的,但请你不要希望去影响太多的人,就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继而改变周遭,改变社会,实现悄悄的生命变革。”我想只要我们秉持这样的理念,期待已久的记忆中的乡村就不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滑落,依然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和祖先之间通达而美妙的情愫,就会在这里永久地传递。此时,我们畅想美丽乡村,极力抢救那些行将消逝的村落记忆,也许只是浪漫的幻想,但是只要我们从脚下开始做起,那些被称为“乌托邦式的乡土”可能就会重现眼前。在高扬城市化的今天,我们的执拗可能偏离了主流,但这样的“逆风而行,逆流而上”,并不是怀旧式的情感宣泄,而是这个时代里我们这一辈人最为真切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邮编:100083。)